

■ 遗产观察

海南岛黎族船型屋的“前世今生”

吴慧

黎族是海南岛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3000多年来,黎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不仅创造了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其中,作为黎族村落传统建筑——船型屋,是千百年来黎族文化的缩影和见证,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黎族人民创造和智慧的结晶。

船型屋的“前世”

船型屋黎语称为“布隆亭竿”,意思是“竹架棚房”,是黎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代表性建筑,目前已经有千年历史。关于黎族船型屋的著述最早见于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记载“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诸蕃志》中也有“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清代乾隆年间,《黎岐纪闻》仍有记载“屋宇形似覆舟,编茅为之,或被以葵叶,或藤叶,随所便也。门倚脊而开,六其旁以为牖。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黎族船型屋的身影,不仅出现在文字记载中,在图画中亦有出现。清代的《琼黎风俗图》和《琼郡舆地全图》中都有关于黎族船型屋的描绘,图中的船型屋样式亦为高干栏式的茅草屋,非常具体形象。

可见自宋至清代,黎族船型屋的主要建造形式为干栏式,屋子建于竹木之上,冬暖夏凉,上层供人居住,下层可以饲养家畜。干栏式建筑为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这种原始的建筑方式可以有效避开南方气候的潮湿和各种野兽虫蛇的侵袭。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黎族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以及民族之间交流融合,黎族的船型屋从高架干栏式向低架干栏式、落地式逐步演变。实际上有些落地式船型屋的内部居住区域离地面有30厘米左右,仍然保留了干栏式建筑的痕迹。20世纪30年代,德国人H·史图博到海南岛黎族地区进行调查,对各地黎族人居住房屋和建筑方法都有详细的记载。在其《海南岛民族志》中,美孚、岐和倅(哈)的房子都是传统的船型屋样式,而位于白沙地区本地黎(润)的房屋却有了变化:“很大的单房顶,以3米高的两根支柱支撑着,其上有比较精工的骨架结构。这种结构使人想起汉族的屋顶结构。”这种具有复杂骨架结构的房顶,应当是金字型屋顶。可见从近代开始,黎族民居除了船型外还出现了金字型屋顶,这是黎族人民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吸收而来的范式,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船型屋发展成金字屋时,屋顶已经没有船的形状,而是借鉴汉族茅草屋有了三角形神兜梁。在屋顶的材料与形式上,通过使用木材搭建屋顶结构,取代了原本的竹片,使



海南岛白查村的船型屋

部屋脊由原来的弧形演变为“金”字的外形特征。这种改变使屋子的高度和人口的宽度都有所增加,同时也增加了室内的空气流通与采光,提高了居住舒适度。

船型屋与营造技艺

船型屋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相传黎族祖先当年乘木舟登海南岛时,由于没有栖身之地,就将木船翻过来居住。为纪念祖先,黎族后人就仿照船型建起了船型屋。二是船型屋用茅草盖顶,厚厚的茅草一直延伸到地面,犹如一艘倒扣的船,故称之为“船型屋”。

船型屋多为长型,屋门多位于短侧两端。屋内房梁到地面的垂直距离不大,地面是平整的泥土地面,墙面基本不设窗口,光线较暗。内部空间通常分隔为两间或三间,房子的中间立3根高大的柱子叫“戈额”,象征着男子,两边立6根略矮的柱子叫“戈定”,象征着女子,代表的是一个家庭由男子和女子组成,传达了黎族男女平等、兼容的家庭观。“三石灶”是黎屋里的传统厨具,其上架锅罐可以蒸煮食物,既方便实用,又可使屋内暖烘和干燥,灶烟还能防止草木蚊虫滋生,因此屋内有生火做饭可以发挥对船型屋的保护作用,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

黎族村落中还有一种较小的船型屋叫“隆闰”,意思是“不设灶的房子”,按照黎族习俗孩子长到十三四岁便要搬到“隆闰”去居住,不与父母同住。“隆闰”一般建在村头村尾僻静处,或紧挨父母住房搭建,是黎族青年男女由相识到定情的小房子。

村落中还有谷仓,一般都选在村落外缘集中或单独建造,利于防火。通常选择较干爽的向阳处,建成干栏式,以防止潮湿和鼠虫偷食。有的地区谷仓就建在耕地中心地带,这样便于储藏粮食。黎族地区谷仓的设立,主要与黎族粮食加工方法有关,习惯于吃多少就煮多少的地区,均用谷仓来储存稻穗,如过去的乐东地区几乎每家都有谷仓。而用牛踩脱粒的地方,谷仓因失去作用而趋于少见。

船型屋的材质多为传统竹木结构,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树、竹、藤、茅为其必备建筑材料。首先以树干做梁柱,用树杈进行承托,用红白藤编搭房屋框架。然后用泥巴与稻草搅拌为一体做墙体主要材料,沿着等距分布的树枝一层一层往上挂泥,逐层堆叠为墙,待阳光炙烤后形成坚硬墙体。最后在屋顶的构架上盖茅草,用藤条将茅草编织在一起,做成一个倒扣船型的拱形屋顶。这种房顶可以有效隔绝空气里的寒潮和热流,在海南这个潮湿炎热的地区,起到了很好的抵御恶劣环境的作用,同时其材料的制作拼装与修补拆卸都非常方便。因房屋是屋盖和墙体为一体的,不仅较容易建造,而且也可节省建筑成本,适应于黎族人早期的游耕习惯,具有一定的经济适用性。2008年6月,“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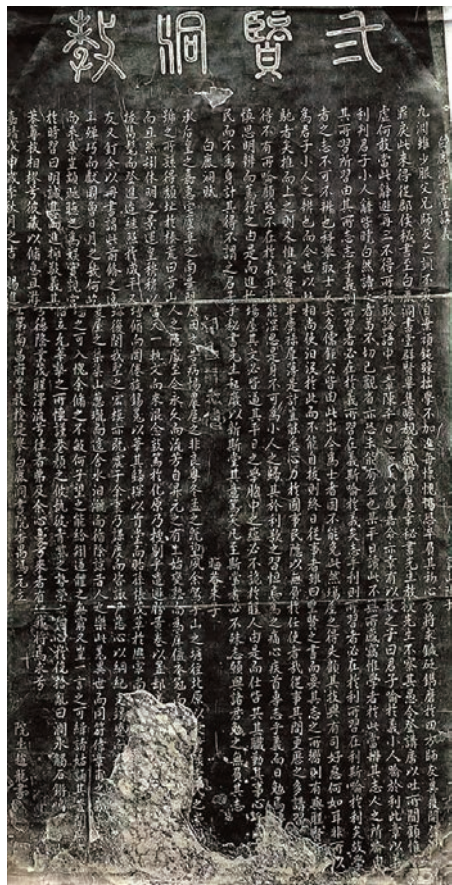
船型屋的“今生”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黎族人也开始走出大山深处,原本低矮阴暗的船型屋与现代人的居住习惯有所冲突,船型屋的生存环境遭遇了严峻挑战。主要转折点为20世纪90年代民房改造,许多黎族人因此离开了世代居住的船型屋村落。黎族地区的民房改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村落中的船型屋被拆后重建为水泥砖瓦房,村民返回原村居住;另一种是出于保护的考虑,村落中的船型屋被整体保留,村民们整体搬迁至数公里外的新村居住。而当时留存下的几处黎族船型屋和金字屋村落,如今仅存东方市白查村和五指山市初保村。

得益于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这两个村落在民房改造时村民整体另迁新村,同时旧村落还有资金不断地进行维护,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探访白查村时恰逢当地文化馆组织的船型屋营造技艺培训班,年轻人正在学习搭建船型屋,可见“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在政府和当地村民的重视下有了较好的延续和传承。2015年,白查村船型屋、初保村民居都被列入海南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者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白鹿洞书院石刻浅谈

黎华



《白鹿洞教》碑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东南五老峰山脚下,东邻鄱阳湖,四面环山,贯道溪从院前流过,建筑面积7800多平方米。它肇基于唐,定名于北宋,盛于南宋,绍隆于明清,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重要景点之一。唐贞元年间(785—805),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又此处四面环山,俯视图,白鹿洞因此而得名。南唐升元四年(940),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庐山国学”或称“白鹿国学”,命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至此,白鹿洞成为当时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今九江)地方人士在此建起了一所书馆,书院之名从此开始,白鹿洞书院也由此在历史上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南宋淳熙六年(1179),大理学家朱熹任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措置田产,征集图书,聘请讲学,招收生徒,手定教规,自任洞主,亲自讲学,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了后来七百年间封建教育办学的指导方针,至今海外的一些学校仍用它作校训。明正德元年(1436),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奠定明清时期白鹿洞书院建设的规模和基础。清代白鹿洞书院达到鼎盛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将白鹿洞书院改为学堂,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被改为江西省高等林业学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修复。白鹿洞书院成为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园林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体,是一处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胜地。

在此专门介绍一下白鹿洞书院的石刻。石刻与“结绳记事”一样,是古人用来记录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方式,是研究书院文化精神的有形载体。白鹿洞书院的石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岩石上的石刻,一般称为摩崖石刻;一类是将石材制作成石碑,在上面刻写诗文,一般称为碑刻。书院的建筑容易朽坏,但石刻却能承受风雨的侵蚀、战火的洗礼流传至今,传递了许多文献资料所欠缺的信息。

首先说说白鹿洞书院的摩崖石刻。现存的摩崖石刻多集中在白鹿洞以及贯道溪河床以及溪两岸的石壁上,均为文字,没有崖画与造像内容。现存摩崖石刻60方,其中宋代14方,元代1方,明代26方,清代17方,时代不明的2方。内容以励志、哲理以及写景、记事等为主,多为名人学者所题,书法精美,与白鹿洞书院环境相映成趣,有着较高的艺术与史料价值。

朱熹兴建书院时,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石刻。朱熹的摩崖石刻,虽然都只有寥寥数字,但却隐含了丰富的内容。例如“文行忠信”四字,刻在洞石上,直径数尺,为朱熹手书,南宋陈焯摹刻。《论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朱熹也是从这四个方面来教导学生的。朱熹的摩崖石刻还有“白鹿洞”“枕流”“漱石”“钓台”,保存完好。朱熹摩崖石刻有一部分是地名标识,如“救白鹿洞书院”“白鹿洞”“鹿眠处”等。

再来谈谈白鹿洞书院的碑刻。现存碑刻157块,主要分布在白鹿洞书院东、西两廊,由于青石碑刻风化严重,宋元时期的碑刻早已荡然无存,现存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碑刻。按照内容,这些碑刻大致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是事务性的碑刻,包括重建书院、重建一栋建筑或修复一道桥梁、添置学田或诸生的膏火费、相关的告示及禁令等。一类是纪人表功德碑刻,一般通称为“教忠碑”。一类是关于学习方面的讲义、训导。一类是游览书院时所写的诗歌、游记,占全部碑刻的三分之一强。这些碑刻多为名人学者和知名的地方官员所写,如胡俨的《重建白鹿洞书院记》明正德七年(1442)、李龄的《重修白鹿洞书院记》明成化二年(1466)、姜性的《白鹿洞学田记》明弘治十二年(1499)、李梦阳的《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明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明正德十六年七月(1521)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朱熹的《朱子白鹿洞教条》,被誉为白鹿洞书院的镇洞之宝。

《朱子白鹿洞教条》是朱熹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对中国教育乃至古代教育的一大贡献,体现了他身体力行兴办和推行书院教育实践的整体思考和总结。在兴办书院之后,朱熹有意识地招收举人入洞学习,就是因为众多举人在应试时没有理解国家开科取士的深刻用意,没有明白“学以致用”到底要求自己学什么,所以要把他们招来,在互相切磋讨论中揭示科举的真谛。在这种情况下,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实现了对接,士子到书院来读书,形式上类似于完成一门“必修课”,在上好这门“必修课”之后,才有真正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朱子白鹿洞教条》,可以看作是一整套不同于科举应试的学习方法。科举考试只关心词章,但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却是义理。因此朱熹提出“五教之目”,就是要求学生简明快捷地把握儒家义理的精髓,如果把握了这“五教”,就具备了基本的儒学知识素养。而所谓的“学思辨”,就是把儒家义理的方法。对于科举考试来说,机械的记忆、对题目的钻研是主要的;而儒家理论必须落实到“修身”这一点上,如果不能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人文素养,则无论学多少知识都是没有用的。因此提出学者如何修身、如何处事接物,就显得很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白鹿洞书院现存的摩崖石刻和碑刻的数量在全国书院中名列前茅,历史上师出白鹿洞书院的有状元三名,进士一百多名。历史上,江西古代志书众多,素有“江右书院甲天下”的美誉。根据江西省地方志办编纂的《江西书院》最新统计,江西有书院近2000所。回顾历史,更需展望未来,合理利用好书院文化资源,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责无旁贷。

(作者单位:九江市庐山茶叶科学研究所)

传统书院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利用

——以湖北新洲问津书院为例

吴红敬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组织,一般认为书院之名出于唐中期。湖北书院历史悠久,自孔子使子路问津并在湖北新洲开坛讲学至今已近2000多年历史。明清时期是湖北书院最为鼎盛阶段,多达200多所,今存世尚有近100所。书院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以修书、藏书为核心,后来演变成行生出图书征集、档案收藏编纂与出版、学术研究、宗庙祭祀、传承儒学、培养人才等功能。湖北新洲问津书院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问津书院的沿革和特色

湖北新洲问津书院又名孔庙,位于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镇孔子河村北,是湖北省现存较为完整的书院建筑。关于问津书院的来历,相传与“子路问津”有关。《论语·微子》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据新洲旧县志记载,自汉淮南王刘安在此建孔庙,设私学起,历代均有废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官倡绅助,将孔庙与书院合建,正式命名为问津书院,其后又几度兴衰,民国以后改为学校。书院坐北朝南,四合院式二进院落布局,占地面积4170平方米,建筑面积1407平方米。有大成殿及左右偏殿、讲堂、孔叹桥等建筑。

新洲问津书院建筑特色鲜明。首先是建筑规制高,该建筑整体布局为中轴对称,且近似正方形,大成殿和讲堂坐落在中轴线上,两个配殿分置于大成殿东西两侧。其次是建筑风格独特,大成殿是书院最重要的单体建筑,正脊下书“皇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仲秋穀旦重建”,为典型鄂东地区特有的民间祠堂庙宇特色。再者,中西融合,兼具庙学合一,中轴线上居于大成殿前面的讲堂,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时期仿欧式近现代建筑。功能上,大成殿是供奉孔子的重要场所,两个配殿分别供奉先贤,历代大儒,名宦、乡贤的牌位,都是专供祭祀用的场所;讲堂则是专门传授知识的教学场地。这种布局安排,突出了问津书院庙学合一的功能。

问津书院的价值

历史价值。问津书院起于“子路问津”的典故。西汉时期,汉淮南王刘安因此地掘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秦隶书石碑,命人在此建亭修庙祭孔。唐武宗会昌初年,黄州刺史杜牧修孔庙并改名为“文宣庙”。宋时期,大儒张栻、朱熹、吕祖谦等都来此讲学。宋末元初,原湖广提举江西名儒龙仁夫,在孔庙旁孔子山麓筑室讲学,世始有称“龙仁夫书院”。明清时期,为问津书院鼎盛时期,明代中期讲学之风盛行,书院多次修葺,万历年间湖广巡抚熊尚文,曾督学湖广,题名“问津书院”,并在河南商城汤池建问津书院分院。清朝时期,成为官方科考取士之所,多次修缮扩建,康熙皇帝御题“万世师表”匾额,嘉庆皇帝赐题“圣集大成”金匾,成为当时全国著名书院之一。清末民初,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书法家张翼翥手书“问津书院”匾额,书院在“文革”期间损毁严重,改革开放后获得新生。

科学价值。书院选址于风景如画的孔子山脚下和蜿蜒曲折的孔子河畔,符合中国传统风水学说。书院整体采用中轴对称布局,别于其他书院左庙右院格局,依据地势采用问津书院独特的上庙下学,后庙前院规制,同时,依据建筑特色将整体建筑群分为教学、祭祀、藏书、生活、游憩五大功能区域。

艺术价值。问津书院整体建筑少雕饰彩绘,多点缀素雅,强调自然,讲究材质、色调、体量、虚实对比和变化。建筑风格、装饰纹样、诗词碑刻、书法楹联、匾额题字等极具艺



问津书院正立面图

术价值,置身其间,给人以浓厚的艺术感染力。

文化价值。新洲是古邾国都城所在地,至今3000年历史。问津书院所留下的史料、史迹、传说、轶事历史积淀丰富。各朝代的名宦大儒士绅留下的有关书院的诗词、歌赋、楹联、匾额及碑碣、图帖、书画、信札、讲义等弥足珍贵,为书院周边的孔子山、孔子河、孔叹桥、讲经台、晒书场、坐石、墨池、砚石、长沮沟、桀溺坂等人文景观独特雅致。

教育价值。千百年以来,问津书院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管理制度、治学规章为不同时期培养出了一大批治国、治学的栋梁之才。特别是问津书院教育培养青年学子的民族正气、道德操守、治学态度、兴学精神、为学人生的价值理念,带动鄂东地区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当代鄂东学凤昌盛和文风兴盛,其教育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社会价值。问津书院是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教育培养生员的,数百年来培养了大量人才。明朝中后期问津书院所推行的一种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式的定期讲学制度,主要围绕德行、伦常、本末等一些基本命题而展开,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问津书院历代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体现了由孔庙而庙学而书院的发展脉络,祭祀对象除孔子外,也祭祀仲子、长沮、桀溺、朱子及名宦、名儒、乡贤等等。问津书院通过宣教、讲学、祭祀等形式,对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问津书院的保护利用

2002年11月,问津书院被公布为湖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北文物部门在充分认证和参考相关典籍资料的基础上,对问津书院鼎盛时期部分已毁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对清理出来的建筑基址、青石路面,覆盖钢化玻璃罩保留在原址,向公众展示原汁原味的文物遗迹。以清晚期建筑布局为主要依据,按照保存较完好大成殿建筑规制标准,对仪门、洁案斋、奉牲斋、魁星楼、文昌阁、丹墀、月台等附属建筑进行复建,基本重现了鼎盛时期的发展规模。新时代持续做好问津书院的保护与利用,应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确定基本思路与目标。以问津书院为主体,以儒家文化和楚文化内涵为核心,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千年书

院遗址的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多方位、多手段全景展现区域珍贵原生态文化遗址。在统筹做好考古发掘与科学保护文物本体及遗址的前提下,建设国家级传统书院文化遗产展示基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培养传承基地,中国楚文化研究推介基地。整体规划纳入长江国家公园建设湖北段组成部分,提高湖北新洲问津书院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带动鄂东地区文化旅游经济发展,逐步形成集文化遗址保护、旅游、教育、展示、传习、研学等功能为一体的传统文化楚文化主题新景区。

二是统筹做好基础工作。首先,通过考古勘探厘清孔庙、庙学、书院发展脉络。考古发掘确定汉刘安初建孔庙处,宋末元初龙仁夫于孔子山麓筑室讲学处,明中期重建正庙题名“问津书院”等处基址。其次,探明孔子问津车辙路径。依据《问津院志》载“山川脉络图”,精准发掘孔子山、问津河、颜子港、晒书场等数十处遗址的准确位置。再次,要开展深入研究。研究孔教儒学南移与楚文化的碰撞、融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对楚文化的影响;研究问津书院演变历史及春秋时期楚国地缘环境及社会状况;研究问津书院及周边遗址文化内涵;统筹做好编制问津书院及鄂东区域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发展规划;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规划设计好遗址保护利用的文化体、价值体、商业运营体,服务于乡村振兴,为文化旅游教育深度融合,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三是科学编制规划。问津书院周边文化遗址丰富,保护利用必须从统筹规划编制入手。在深入研究认证的基础上,科学编制问津书院保护利用规划,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规划,周边文化遗址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周边环境整治专项规划等,并将规划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统筹谋划问津书院及周边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的思路、政策、项目、举措。

四是开展环境整治。恢复问津书院及周边文化遗址历史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影响文物风貌的后期改建、新建、搭建的建筑体,分别予以拆除、拆迁或改造;对文物周边及保护范围内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化改造,电力、网络通讯、给排水管线进行地下埋设;孔子河及周边的道路、山丘、桥梁、小溪、水塘、垃圾站等进行统一规划整治,科学合理地做好绿化与自然水系治理。

(作者单位: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